

世界的分裂：冷战的兴起

谢伟良 著



从盟国到敌国的演变
两大阵营的建立与瓦解
二战后东西方对峙的历史
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转化

A 世界史纵览
Survey of World History

世界的分裂：冷战的兴起



長 春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的分裂:冷战的兴起 / 谢伟良著. —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0.1
(世界史纵览)

ISBN 978-7-5445-1149-0

I. 世... II. 谢... III. 冷战-国际关系史-通俗读物 IV. D81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8268 号

世界史纵览

世界的分裂:冷战的兴起

著 者: 谢伟良

责任编辑: 张耀民 程秀梅

封面设计: 徐力坚

版式设计: 王国擎

插图作者: 尹小光

出版发行: 长春出版社

总编室电话: 0431-88563443

发行部电话: 0431-88561180

邮购零售电话: 0431-88561177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 130061

网 址: <http://www.cccbs.net>

制 版: 长春出版社美术设计制作中心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75 千字

印 张: 18.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8.00 元(全 20 册)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010-60292266

总 序

中国需要世界史知识的普及,因为她正在走向世界。

中国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与世界频繁交往,交往的广度与深度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根据我国外交部的统计资料,截至2009年7月,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总数达到171个,遍及全球。中国与世界的人员往来也更加频繁。根据国家旅游局的统计,2008年我国出入境旅游总人次接近1亿(其中,入境5305万,出境4584.44万)。据教育部的统计,从1978年以来,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139.15万,2008年创了历史新高,达到17.98万;其实,早在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统计数字就已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出国留学人数最多的国家,全世界几乎每7个外国留学生就有1个中国学生。中国也受到了海外留学生的青睐,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国累计接收来华留学生146万人次,2008年首次突破20万,共有来自189个国家和地区的22.3万来华留学生。经济交往更为繁盛。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的统计分析,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是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的开放,2004年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中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迅速提高,2003年就突破了50%,2006年达到67%,2008年尽管开始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

超过60%。伴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世界也在迅速走进中国。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融与冲突也日益加深。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不但加速了中国从货物输出国向资本输出国的转变,而且还使中国日益卷入国际贸易纠纷之中。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更多地了解我们所打交道的对象,了解他们的历史文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与文化特征。

了解外界,学习世界历史是眼前现实的需要,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则是培养21世纪国民基本素质的需要,很明显,现代国民一定要有世界眼光。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不仅是在战场上、在商场上、外交谈判桌上,乃至日常友好交往中,概莫能外。优雅、良好的国民和政府形象,既需要经济实力,又需要优良的文化素养,其中中外历史文化知识当然不可或缺。此外,学习外界文明与文化,也是改善我们自己文明与文化的需要。应当承认,上述对外交往和对外商贸的成绩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古人亦云,“择善而从”“从善如流”,似指个人修养的一个重要原则,何尝不能用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历史证明,没有任何一种文明是铁板一块,完全的、纯粹的原生型。交往促进发展,共融产生文明。但凡文明,特别是有生命力、有影响力的文明,都是在碰撞和交往中产生,又在不断交往中发展与共生。现代国民和国家尤其应当有一种开放和自信的心态。开放不会失去自己,只能使我们更加丰富,更加健康。

人类社会不同地区的交往很早就开始了,但真正把世界逐渐连为一体的还是新航路开辟以后。此前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交往大多是局部的、暂时的,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各地人们不可避免地发生联系,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是主动还是被动。中国最初与现代世界的交往就是被动的,甚至是屈辱的,那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鸦片战争。从此自以为天朝大国的政权再也不能无视外面世界的存在。林则徐自觉“睁眼看世界”,表达了那一代中国仁人志士最明智的判断和认知。此乃

痛定思痛后的反思：泱泱大国败于远渡重洋而来的蕞尔小国，气难咽，恨难消；可为什么会输掉？又如堕烟雾，一筹莫展，开战前林则徐甚至认为英国士兵“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参见鸦片战争前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七月奏折《请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遑论对手的军事火力、武器性能、游戏规则乃至心理与文化！林则徐之痛，是国人之痛，民族之痛！痛苦促发顿悟，从而记录了中国人的—次惊醒，弥足珍贵，事实上它也的确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在“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逐渐认识世界，同时重新审视自己和自己的过去。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有不曾间断的文明，很久以来即以天下之“中”自居；然而，此时发现我们的武器库中两样家什至为罕见，甚至不曾拥有，那就是“科学”与“民主”。这是天大的发现，是经过剧烈的文化碰撞和苦难洗礼后迸发出的社会思潮，大概也是五四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依当下的看法，对西方的这种认识未必准确，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评判亦不无偏颇之处，但无论如何，比之前辈的认识水准无疑大大迈进了一步。这是真正历史性的进步，面对“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产生了数千年来未有之眼光。或者说，面对—个不同的文化参照体系，直面自身，重新评估了自己的形象。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解外来文化的另—个重要价值：在比较中产生鉴别，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从而试图改善自己。

对外界文化的研究，我国学术界曾问世过—些相当不错的著述，如前不久人民出版社以《西洋史系列丛书》方式再版了9种专著，可见一斑。不过，系统的世界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和世界史教育的普及，总体讲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打破旧的思想樊篱，走出一片新天地：大量的国外研究成果被译介，许多研究领域被开拓，陈旧的知识体系和概念被更新。世界史学科正在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重要的思想和学术资源。而且，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成果也正在逐渐缩短与国际水准的距

离。每年,应该说每天,都有从研究对象国归来的学人,一些原始资料开始能从网络上直接获取,一些领域甚至可以做到与国外学者直接对话。毫不溢美地说,世界史学科的进步是出类拔萃的,中国世界史学科进入了春天。

一线的研究成果需要系统地梳理,细细地消化,而且应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和吸纳。世界史学者有这样的责任,中国也存在相应的文化市场需求。近些年,已经有一些简明的世界史读本面世,这些著作图文并茂,为传播世界史知识做出了贡献。但总体而言,我们的世界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仍然比较薄弱,尚存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世界史纵览》这套丛书,试图向大众传播鲜活的世界史知识,注重世界历史的主线与全局,注重社会生活史元素,注重行文风格的灵活轻盈。这套丛书的作者大多为中青年学者,他们有自己的优势,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很多缺陷。真诚地希望前辈学人对这些年轻学者予以指教,使之更好地成长;更真诚地希望他们的劳动成果为更多的国人分享。

侯建新

于天津师范大学欧洲经济—社会史研究中心

2009年10月25日

写在前面

东西方两大阵营问题是战后世界历史、战后国际关系史和东西方关系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战后东西方尖锐对抗时期,两大阵营被看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两大社会制度、两大阶级集团进行大决战的载体;在冷战缓和时期和冷战结束之后,两大阵营则通常被视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形态,但仍强调其本质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价值体系的对抗。不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中国,这种认知从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学理框架上,而是直接从冷战理论植入到学术领域,并且长期形成为思维定式。中外一些论者和观察者甚至置身于这种对立之中去论是非,这种方式与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与专业性的要求是有出入的。

本书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历史事实来揭示东西方两大阵营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形成的历史轨迹,从而认定东西方两大阵营的真实本源是源自美国和苏联从战时合作转化为战后对抗,并且在冷战成为趋势的过程中,构建两大排他性的联盟体系进行集团化的对峙。美苏两极对抗是原发性因素,两大阵营是这种对抗的产物和集团化了的对抗形态,也就是说,首先是雅尔塔体制以美苏合作而面世,接着是该体制以美苏翻脸对抗而“催生”了冷战,伴随着冷战“孕育”了两大阵营,最后在冷战结束时

三者同时“涅槃”。这一历史演变过程恰好说明了美苏对抗与两大阵营之间的“血脉派生”关系。

毫无疑问,冷战时代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冲突是激烈且无处不在的,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浅表的现象,是冷战的表面特征,不是问题的本质。导致美苏冲突并且进行冷战的根本原因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现实的国家利益争夺,但是在现实对抗中,美苏都偷梁换柱地把意识形态信条变成它们之间进行利益争夺的保护色;美苏都把它们之间势同水火的利益冲突和争夺,掩盖在两大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两大社会制度的冲突之下,这正是刻意凸显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性质的奥妙之处。这种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其实是由展开冷战之需要所赋予的,历史的真相被蒙蔽在先,再被曲解在后。本书在对两大阵营产生、形成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做出一个大胆的判断,即两大阵营的性质是美苏主导下两个国家集团所形成的联盟体系,它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在本质上没有直接关系,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产生不了历史上的两大阵营。

本书是一本专题性的学术性读物,涉及的历史背景广泛而复杂,对于与本书主题关系密切的史实会力求加以较为详尽清晰的揭示,而在一些关联性内容方面只能采取化繁为简的处理方式,简明提示。

本书如果能够帮助读者开拓有关东西方两大阵营问题的思路与视野,那正是本书作者的本意与真实的期望。本书的整个框架是探析性质的,不足之处显而易见,尚望读者不吝斧正赐教。

编委会

总顾问

侯建新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院长,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主 编

张乃和

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张庆海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副主编

龙秀清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毕建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张景全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 洪	凡斤斤	毛欣欣	王 平	王 艳	王艳峰
王 最	代国庆	冯金朋	卢兆瑜	史海波	豆华娜
李 莹	张 美	陈日华	陈 静	范绮芹	杨晓敏
杨晓聪	杨翠红	赵博文	郭少琼	郭丽娜	徐丽丹
谢伟良	蔺志强	翟 宇	黎英亮	鞠长猛	

目 录

总 序	001
写在前面	001
第一章 两大阵营问题的定位	001
属性定位问题解读上的歧义	001
评判规范问题的界定	005
两大阵营问题阐释上的相关学理考察	012
第二章 两大阵营产生的本源	019
罗斯福的“大国合作”战略本已排除美苏对抗	020
丘吉尔和杜鲁门祭起遏制大旗	037
意识形态渗入对外战略及外交决策机制	060
两大阵营建立的国际政治基础	072
第三章 美苏主导下的东西方关系	077
战后东西方关系形成的背景与前提	078
美苏关系恶化趋势下的东西方关系定位	094
第四章 两大联盟形成的历史轨迹	103
美国对苏遏制战略的形成与苏联的反制	104

西方阵营建构的历史轨迹	115
东方阵营建构的历史轨迹	140
第五章 两大阵营对美苏的从属性	153
东西方关系的层次分解	154
制约战后东西方关系的根本力量	159
第六章 两大阵营的功能与作用分析	167
两大阵营与雅尔塔体制	168
两大阵营与冷战对峙	172
两大阵营的护卫功能	179
第七章 两大阵营瓦解的历史后果	184
东方阵营的分崩离析	185
西方阵营的弱化与内部分化	207
废墟上崛起的新国际战略中心与多极化趋势	233
第八章 从冷战终结反观两大阵营问题	240
冷战终结的表征、性质与含义	240
从冷战结束再看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性质	244
后冷战时代:淡化的意识形态对立	248
附 录	253
大事年表	253
参考文献	278
写在后面	284

第一章 两大阵营问题的定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产生、形成，在冷战时期通常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两大社会制度、两大阶级集团以及分别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作为载体的对抗格局。这一表述主要包含两个迥然相异的学理层面，即两种意识形态价值体系的对立以及两个不同的国际政治联盟体系的对立。迄今为止，现有的中外出版物，比较规范的教科书和学术专著已经较少大肆渲染学理上无法对接的两种典型的意识形态观点，但是仍有不少学术性专著和普通读物以及各类文章继续持有冷战时代的见解。值得注意的是，在冷战时代结束后的中外学术界，普遍地还是把东西方两大阵营问题的根源及本质定位在两大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以及由此衍生的国家制度、对外政策与行为的对抗上。这种定位存在明显的学理阻滞，求证于战后初期的历史演化过程并且进行相应的学理分析，则其正当性与准确性就值得质疑和商榷了。

属性定位问题解读上的歧义

首先，能否就战后东西方两大阵营问题给予恰当而经得起推

敲的属性定位,这是一大关键问题,它涉及如何认识、分解、把握雅尔塔体制——美苏两极体制以及战后冷战时代的整个国际体系问题;同时也关系到如何分析、评判两大阵营本身的建立、存在以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和产生什么样的现实的和历史的影晌等问题。

两大阵营问题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体系框架下的国家间关系问题,即是国际关系问题,今天来看就是一个有特定环境和时空条件下的历史问题;它在战后世界历史中不应该是一个哲学问题,也不是一个直接的意识形态价值理论运用问题。既然必须定位在国际关系的层面上,那么,对它的表述,对它的认识、分析和评判就应该使用一套相应的语汇和相应的学科理论与原理。迄今为止,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的学术界,现状则是意识形态语言体系与有关对外关系方面的学科语言体系混杂在一起,这往往难于经受逻辑梳理与学术性推敲。对于某些论者来说,“好处”是左右逢源,在需要进行充分逻辑论证的地方往往使用几个意识形态术语就对付过去了,而对于读者来说则意味着不得要领乃至被误导。

或许有人会争辩说,在经历了冷战时代之后的当今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因素已经明显渗入并且寓于国际政治领域,故意识形态问题本身就是国际政治机体的组成部分了。这确实令我们感到颇为困扰与无奈。那么我们是认可并且接纳这种渗入呢,还是有必要加以正本清源地厘清而予以适当的阻隔呢?本书自然是选择后者,但这将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我们不敢奢望能达到这一目标,不过仍将表明我们的立场。

就东西方两大阵营问题来说,不论在西方世界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之中对其定位上,都已经打上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的烙印,时至今日,这种思维定式仍然非常普遍,深入人心。问题尤其严重的是,许多人本来应该是作为观察者而不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已作为两大阵营对抗的当事方,然后置身于其中去论是非。

有某些近期的论著仍然认为意识形态支配着、制约着两大阵营关系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是值得商榷的。本书认为,这种浓厚的色彩其实是由展开冷战之需要所赋予的,历史的真相被蒙蔽在先,再被曲解在后。这种意识形态色彩事实上只不过是两股角力的国际政治力量的保护色而已。

尽管有学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在冷战期间曾发生过重大变化,即由意识形态对抗转向美苏争霸,而不是在冷战时代自始至终都是意识形态对抗。(阎学通:《冷战后的继续——冷战后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3期。)在战后历史的演化过程中,是否存在这样的转变,以及这样的立论与思维方式是否恰当,同样值得商榷。但是,这种观点还是认同了导致冷战和在冷战局面形成后一个时期内,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关系是建立在双方的意识形态对抗之上。

本书在此进一步明确宣示,战后东西方两大阵营问题是国际关系框架之下,由美苏两大强权的外交战略冲突而派生的国家利益主导下的国家集团化问题,美国和苏联分别作为主导型大国在外交层面上的对抗是构建两大阵营的原发性因素,两大阵营则是这种对抗的派生物,即美苏在国家关系的层面上已经形成并且正在展开中的对抗是导致产生东西方两大阵营的逻辑前提,其中的主次关系不容颠倒;它是国际政治学、国际战略学、外交学中的国家联盟体系问题,或称为国家集团化问题。在排除意识形态含义的条件下,两大阵营问题本质上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协约国与同盟国的框架,即在同一个国际体系之下构筑的两个次一级的对立联盟体系,尽管它们在名称、规模与波及面、或在结构与运作模式上有很大的不同。

或许人们会指出,战后东西方两大阵营存续时期的意识形态对立是如此显而易见,怎能试图排除它呢!没错,本书并不否认这种现象与基本事实的存在,但是却认为它是浅表的、第二位的因素,是对抗双方决策层刻意加以渲染出来的,由此影响并且引导

着国际舆论和人们的思维,成为堂而皇之的保护色,这层保护色被赋予什么功能呢?那就是为有史以来实力最雄厚的大国较量可能出现惊天动地的碰撞而预先抢占道德制高点,在对外交往中粉饰其道德优越感与欺世的使命感。这种国家交往中的意识形态对抗,是外交领域中缺乏法理和学理支撑的战线延伸,相对于实力政治的现实较量——例如军备竞赛或领土扩张而言,由于它表面上具有低资源投入和低消耗的低廉成本优势以及本身甚低的战争风险(即使发生战争,本质上肯定不是由于意识形态对立引起的),一旦对抗双方摆开了架势,就会很快发展为愈演愈烈而难于遏制的趋势。但是鉴于在外交领域展开意识形态对抗,将严重恶化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实质利益关系,所以,事实将最后证明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对抗的总成本和代价是极为高昂的。

战后几十年来,外交领域的意识形态纷争已经司空见惯,一些论者试图论证和揭示其合理性及必然趋势。但是我们强调,这不是外交较量的实质层面,尤其是把它摆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这面“照妖镜”之下去考察,人们就会看到真相。

自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首次形成国际关系体系以来的三百年国际交往史中,意识形态因素极不寻常地在冷战时代成为外交战略的所谓决策依据,并经常被用来解释为国家行为的终极依据。

这是一种因应超级大国面世的真实的时代变迁呢,抑或是一种障眼法下不真实的异化?美国老资格的参议员、担任过十几年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威廉·富布赖特曾经这样指出:“我们绝大多数人深深地依恋着自己的价值观念,并笃信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但是当你查看一下外交政策,就会发现政治领袖们的慷慨陈词,坦诚地谈论理想,却很少描述他们的真实政策,而更常见的印象是模糊他们的真实政策。我们通常是在掩饰我们的激烈争夺

和私利。”(威廉·富布赖特:《帝国的代价》,简新芽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8页。)通过对战后初期美苏有关的外交战略决策的历史事实详加梳理,本书可以给出一个明确的判断。

评判规范问题的界定

我们需要明晰东西方两大阵营的确切定位,是由于它在论证体系上首先牵涉到至关重要的使用一套什么样的分析方法与评判规范问题。

人们都知道,在文明与文化问题上,尤其是在意识形态价值观上,无论是在国际社会还是在一个国家内部,都会产生激烈的论战和严重分歧,个中原因太复杂了,探究起来也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归根结底是由于对立的各方未能寻求确立和使用一套获得彼此认同与尊重的评判规范。当然,从人类思想史的沿革过程来看,试图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一套可以折中的评判规范是徒劳而不现实的。对此,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最明智而且也值得称道的做法就是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在外交渠道中避免以己之所欲强加于人而伤及国家关系。国际社会在制定国际法原则时,历来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平共处,即使在战后东西方两大阵营严重对立的时期,亦是坚持这种主张。1957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专门通过并发表了《关于国家间和平共处宣言》,其中强调:联合国大会“考虑到加强国际和平及国家间发展和平与睦邻关系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无论它们处在何种意见分歧或利害相关的时期,无论它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性质如何,”都应该依照《联合国宪章》“促成这些目标并发展国家间和平宽容关系。”宣言呼吁各国“扩大国际合作和以和平方式缓和紧张局势,解决国家间不和及争吵。”(齐世荣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一分册,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230页。)这种

